



少女时代



中学生铁凝



铁凝文集封面



成熟从容的铁凝

么才能成为一个作家呢？”徐光耀告诉她：“当作家首先应该有生活。”铁凝问：“生活在哪儿呢？”他回答：“生活在基层。你想当作家吗？那你就到农村去。”

为了“鬼祟的作家梦”

1975年7月，铁凝高中毕业了。按政策规定城市居民家中老大可以免于农村。当时还有一个好机会——铁凝芭蕾舞基本功出色，二炮文工团给了她一张《入伍登记表》，只要一填就可以当上“特招”的文艺兵。可铁凝心中已有“鬼祟的作家梦”：“我要去农村插队落户。”

铁凝来到了距保定100多里的博野县张岳生产大队(村)。正巧小学缺一教师，大队支部决定让口齿清晰、语言纯正的铁凝去当老师，但她坚决婉拒了，因为她不当文艺兵主动来农村，就是为了体验真正的农村生活。她在日记里写道：“我可不能出了校门又进校门，在农村我永远是一名小学生！”

无论酷暑严寒，太阳高照还是北风呼啸，铁凝打实地自觉劳动，连扶犁耕地这样的“高技术活”也学会了，白里透红的脸被太阳晒黑且层层脱皮。平日还要自己擀面炒菜、洗衣补鞋、推碾子磨面。一位叫素英的农村姑娘为铁凝过18岁生日时，把麦秸秆编成的戒指套上铁凝的手指，发现她双手上竟有12个血泡，忍不住捧着她的手哭起来。一次，父亲去看她，见宝贝女儿正挑大粪为庄稼施肥，而且脚还有点痲，原来她的脚因冻疮烂了个小坑，心疼得不得了。她却轻松地说：“没关系，等过了冬天就会好的。”她后来回忆说：“我当时主要就是种棉花，也就是我在小说《笨花》里写到的种棉花，没有那段经历，我就不可能写出这部长篇小说，所以我很感谢当年农村的那段生活。”

每天晚上，她不顾劳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将白天的所做、所见、所思记录下来。她还创作了《夜路》、《燕子的队伍》等小说，发表在多家文学期刊上。

佳作连连

1979年1月，在农村当了4年农民的铁凝带着10多本插队日记和一张

我与铁凝是同龄人，学生时代就读过她的处女作《会飞的镰刀》。而真正走近她，已是2011年的4月，在浙江省作协名誉主席叶文玲文学馆开馆活动中，和她一起去吴子熊艺术馆看玻璃雕刻，听她在开馆仪式上热情致辞，看她与叶文玲亲切拥抱。她卷发齐耳、容貌端庄、举止文雅、言谈得体，显示出低调做人、高格做事为文的品格。

作文写成小说

铁凝其实不姓铁，姓屈。1957年出生于北京，父亲屈铁扬是一位画家，母亲是声乐教授。上世纪60

她为了当作家，选择了到农村插队，经历了漫长的道路，终成大器。她的人生像一首诗、一幅画、一本书……

阅读铁凝

徐忠友

年代初，铁凝随父母来到河北省保定市安家，跟父亲学画画，跟母亲学音乐，但好像都不太上心。

上中学前后，铁凝悄悄读了一些中外名著，一上作文课就亢奋，思路敏捷，想象丰富。一天，老师布置《记一次学农劳动》的作文，她却自己想出个新题目——《会飞的镰刀》，一气呵成一篇近7000字的大作文：几个城市女学生到村里学农割麦子，农村男孩小强及福儿趁夜深人静，悄悄地把她们的镰刀吊到楼上磨。女学生们通过“放哨”，终于发现了镰刀会“飞”的秘密。

看到这篇“出格”的作文，老师先是不悦：“她怎么没按我的题目写？”看到一半时惊疑不定：“一个中学生，能写出作家才能写的大文章吗？”最后是感动，决定把它作为范文，让铁凝在作文课上向同学们朗读。

铁凝回家给全家人朗读这篇作文，父母亲听后激动不已反复追问：“这是你写的吗？你是不是对写作特别感兴趣？”父亲带铁凝去见《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徐光耀看过文章后说：“我真的没想到，你真不错！你写的这个已经是小说了。”

铁凝激动地问：“徐老师，我怎么才能成为一个作家呢？”徐光耀告诉她：“当作家首先应该有生活。”铁凝问：“生活在哪儿呢？”他回答：“生活在基层。你想当作家吗？那你就到农村去。”

为了“鬼祟的作家梦”

1975年7月，铁凝高中毕业了。按政策规定城市居民家中老大可以免于农村。当时还有一个好机会——铁凝芭蕾舞基本功出色，二炮文工团给了她一张《入伍登记表》，只要一填就可以当上“特招”的文艺兵。可铁凝心中已有“鬼祟的作家梦”：“我要去农村插队落户。”

铁凝来到了距保定100多里的博野县张岳生产大队(村)。正巧小学缺一教师，大队支部决定让口齿清晰、语言纯正的铁凝去当老师，但她坚决婉拒了，因为她不当文艺兵主动来农村，就是为了体验真正的农村生活。她在日记里写道：“我可不能出了校门又进校门，在农村我永远是一名小学生！”

无论酷暑严寒，太阳高照还是北风呼啸，铁凝打实地自觉劳动，连扶犁耕地这样的“高技术活”也学会了，白里透红的脸被太阳晒黑且层层脱皮。平日还要自己擀面炒菜、洗衣补鞋、推碾子磨面。一位叫素英的农村姑娘为铁凝过18岁生日时，把麦秸秆编成的戒指套上铁凝的手指，发现她双手上竟有12个血泡，忍不住捧着她的手哭起来。一次，父亲去看她，见宝贝女儿正挑大粪为庄稼施肥，而且脚还有点痲，原来她的脚因冻疮烂了个小坑，心疼得不得了。她却轻松地说：“没关系，等过了冬天就会好的。”她后来回忆说：“我当时主要就是种棉花，也就是我在小说《笨花》里写到的种棉花，没有那段经历，我就不可能写出这部长篇小说，所以我很感谢当年农村的那段生活。”

每天晚上，她不顾劳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将白天的所做、所见、所思记录下来。她还创作了《夜路》、《燕子的队伍》等小说，发表在多家文学期刊上。

佳作连连

1979年1月，在农村当了4年农民的铁凝带着10多本插队日记和一张

常睡的旧棉被回到保定，进入地区文化局创作组。第二年调入地区文联《花山》编辑部，担任小说编辑。

工作之余，铁凝开始捣腾在农村写的日记，将里面的素材提取出来。1980年，她的第一本小说集《夜路》正式出版。

1982年夏天，铁凝参加《青年文学》笔会期间，写出了短篇小说《哦，香雪》，用诗化的语言，将香雪等山里的姑娘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与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年，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次年，《哦，香雪》摘取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3年，铁凝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被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红衣少女》上映后，社会上一度因此流行红衬衫。

1984年，铁凝调到河北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并当选为河北省文联副主席。1986年，铁凝创作的中篇小说《麦秸垛》获得1986—1987年《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1988年，她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在《文学四季》创刊号发表。这部作品一改铁凝以往清新理想的诗意图风，透过几代女人生存竞争间的较量厮杀，彻底撕开了生活中丑陋和血污的一面。

1993年，铁凝的中篇小说《对面》，获得该年度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庄重文文学奖”。1994年，铁凝创作的长篇小说《无雨之城》连续4个月列为上海、深圳、北京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1997年，铁凝短篇小说《安德烈的晚上》获《小说选刊》年度奖。1997年，铁凝的散文集《女人的白夜》，一举荣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

1999年初，铁凝创作的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获得该年度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庄重文文学奖”。1999年，铁凝创作的长篇小说《无雨之城》连续4个月列为上海、深圳、北京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1997年，铁凝短篇小说《安德烈的晚上》获《小说选刊》年度奖。1997年，铁凝的散文集《女人的白夜》，一举荣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

多远》在《十月》发表，刻画出在历史转型与时代变化中，当代都市女性的思想意识与生活状态。2001年，《永远有多远》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同时还分别获得首届“老舍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北京市文学创作奖等众多奖项，实现了获奖“大满贯”。

2000年初，铁凝的长篇小说《大浴女》出版，细致而又精确地透视了一个女性在各种因素羁绊下事倍功半的一生，重新审视并叩问了亲情、爱情与友情。法文版《大浴女》由法国基基耶出版社出版。

2005年底，铁凝推出了又一部力作——长篇小说《笨花》，首印数即达到20万册。故乡里的棉花、麦秸和泥土气息，让铁凝灵感澎湃。

做务实又有文气的官

1996年10月，铁凝当选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当时，省作协没有办公楼，有的只是债务。铁凝和作协党组成员共同奔波，于1998年3月开工建设河北文学馆工程，总投资5300万元，由省作协办公区、文学院、文学馆展厅、报告厅、多功能厅、图书阅览室等部分组成。1999年9月顺利竣工，成为全国唯一的省级文学馆和作协办公大楼。

1996年底，她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06年11月当选为主席。这是中国作协继茅盾、巴金之后的第三任主席，也是中国作协50年历史上的首位女主席。当时外界认为：这宣告了中国作协“权威时代的结束，男性时代的结束，传统时代的结束，老人时代的结束”，有人一度感到不适应。2011年11月，铁凝经投票连任作协主席，说明她圆满通过了中国作家代表们的5年考评。

在作协主席位置上，铁凝“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在推动《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的修改、提出作协机关去“衙门化”的改革新思路、加强文学新人的培养和重视网络写作并正确引导(第八届全国作代会上，网络文学作家“唐家三少”、“当年明月”当选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和尝试。

2006年，她的长篇小说《笨花》被荐参加“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得知这个消息，她马上给中国作协书记写信，郑重提出：在我担任作协主席期间，我的所有作品不与中国作协主办的任何文学奖项的评选。《笨花》成了“无花果”。

在省部级官员和作家这两个身份之间，她是如何处理的呢？她的回答是：我不会将作协主席当作一个官来做，身上不要沾官气。但该付出的时候义不容辞，尽心尽责。当作协主席对文学创作或多或少是有影响的，如日常事务多、时间非常紧张，精力要分散，但我对文学还是深爱着的，并力图使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地有所突破。不管怎样，我还是一个作家，一个不愿意让读者失望的作家。

很少有人知道，1975年，年仅18岁的铁凝在农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7年，铁凝当选为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之后，她又出席了党的第十四次、第十五次、第十六次、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被选为党的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今年8月，铁凝又光荣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成为全国党代会代表中为数不多的“六连贯”人士，充分说明了党和人民对她的肯定和信任。

铁凝的人生像一部书，值得认真阅读。

汉学家的中国伴侣

李莹洁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西方汉学家的积极译介和推荐是重要条件。

近年来，西方汉学家作为一个群体日渐进入普通中国人的视野：李约瑟、高罗佩、魏斐德、马悦然、葛浩文、宇文所安、顾彬……这些西方男性汉学家中的许多人娶了中国女人为妻。有人戏称，“欲做汉学家，先娶中国妻”。当然，也有西方汉学家嫁给中国男人的例子，比如莫言《红高粱家族》和《生死疲劳》的翻译者陈安娜、瑞典人、本姓古斯塔夫森，就嫁给了来自中国的翻译家陈迈平。

汉学家的中国妻子

作为诺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不仅对中国文化感情深厚，对中国姑娘也情有独钟，他前后两任太太都是华人，有两段美好的异国情缘。已故原配陈宁祖，四川人，马悦然1948年到四川进行方言调查时住在陈家学习汉语，学习之余谈情说爱，于1950年喜结连理。

1996年，陈宁祖因病辞世。9年后，马悦然又娶了一位中国太太，台湾媒体人陈文芬。两人1998年初识于台湾，“密恋”多年后于2005年在山西宣布婚讯。今年84岁的马悦然与陈文芬相差43岁，属于典型的“忘年恋”。

类似的例子还有钟爱唐诗的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妻子田晓菲，她5岁习古诗，10岁出版诗集，13岁直升北京大学。20岁开始攻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35岁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正教授，是出了名的才女。田晓菲在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期间，宇文所安曾是她的导师。

高罗佩是荷兰汉学家、外交家、翻译家、小说家，他的侦探小说《大唐狄公案》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中国的福尔摩斯”，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高罗佩的妻子水世芳为清代名臣张之洞的外孙女，其父亲水钧韶曾任中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工作，后来任天津市长。水世芳不仅是名门之后，而且是齐鲁大学毕业生。

莫言作品的翻译者、73岁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同样娶了一位来自台湾的中国妻子林丽君，她在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和文化，也跟先生一起做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

中国贤内助对汉学家的帮助

中文是入门易而进阶难的语言，汉学家们的汉语言天赋和造诣自然是不在话下的，但娶一位中国夫人，对其成为汉学家是否有所帮助，却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有趣话题。

著名学者许子东说：“那些主要的翻译家，不是老公就是老婆是华人，说明文学翻译之难啊，说明独立的外国人，他翻不了这东西，他非得靠旁边有人帮助。”葛浩文和林丽君夫妻合译了毕飞宇的《青衣》、《玉米》以及台湾女作家朱天文的《荒人手记》等一批作品。一般由林丽君先做第一稿，葛浩文再根据原文修改、增删译文，形成第二稿。林丽君对照原文，从头到尾再修改一遍译稿，成为第三稿。然后葛浩文再看一遍，此次不对照原文，只专注修饰英文翻译，使之流畅，是为第四稿。出版社编辑看完后，两位译者再根据编辑的意见和想法修改、润饰，此为第五稿。排版后再给译者看一次，为第六稿。

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据说也是在妻子水世芳的鼓励下完成的，她引导高罗佩研读了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并鼓励他从洋人的角度来写中国版的福尔摩斯。高罗佩对主人公狄仁杰屡破奇案大为折服，才着手研究和比较西方侦探小说和中国断案传奇，随后创作了英文版《铜钟案》、《迷官案》、《黄金案》、《铁钉案》、《四漆屏》、《湖中案》等十几部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最终构成了高罗



陈安娜

名流



马悦然和陈文芬



葛浩文和林丽君



李约瑟和鲁桂珍



水世芳



高罗佩

啊，它不是一亩两亩，它百亩一片非常整齐，100亩田看得像一亩田一样，我很高兴，非常好！”

袁隆平一边往前走，一边和参与生产的农技人员继续交谈：“去年在湖南隆回县试种的超级稻亩产达到了926.6公斤，那里是海拔地区，水稻生育期较长，具备高产的生态环境。这一次在舒城县进行高产攻关，是首次在低海拔地区进行试验……”我赶紧提问：“袁老师，舒城能达到800公斤以上的产量，是不是很好了呢？”袁隆平在人群中搜寻声音的来源，随即把目光定格在我身上。他面对着我，清晰又有力地回答道：“非常了不起。从田间水稻的表现来看，超级杂交稻在舒城百亩示范创造了低海拔地区亩产新纪录！”

周围一下变得安静下来，大家都在仔细聆听这位伟大科学家对中国未来水稻种植方向的预测和分析。我继续问道：“这是不是代表着超级稻在低海拔地区有着很高的推广价值呢？”“那是肯定的，村里的主任刚才对我说，他们自己种植水稻的亩产能达到500公斤，就已经很好了，这个超级稻能达到800公斤，一亩增长了几百斤啊……”我说：“袁老师，您知道咱们这里的农户是怎么说您这稻的吗？”他们说：“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的水稻呢！”听到这里，袁隆平高兴地笑了起来：“那是不假，他们肯定没见过。这个水稻一株能长五六百粒稻子，他们种的一株只有三四百粒，肯定不一样的，他们当然没见过……”在场所有人都鼓起掌来，现场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笑声、掌声久久地回荡在金黄的稻田里。

袁隆平到舒城

周海燕



袁隆平在田间

今年秋收季节，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来到安徽省舒城县，察看杂交水稻的长势和测产情况。接到采访任务时，喜悦一下包裹我全身。《鲁豫有约》做过一期袁隆平专访，从生活角度向大家展示了他鲜为人知的有趣故事。原先我以为袁先生是个挺严肃挺木讷的老人家，谁知他竟是那么风趣幽默。这让我渴望能早点见到这位可爱的老人。

这天上午10点50分，一辆中巴车缓缓地停在了路边，在大家亲切的簇拥下，袁隆平面带笑容走下车，在稻田边查看超级稻的长势，兴致勃勃地和身边的农技人员预测着今年的产量。机会来了，我立即接上话茬问：“袁老师，您看今天测产的情况会怎样？”一句话问完，我的心紧张得怦怦直跳，感觉声音好像不知从哪个地方冒出来的一样，那么虚幻和飘渺。但袁先生却回答了：“舒城这边的长势很好，凭我的经验亩产800公斤以上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很不容易

实现幸福的最大可能

研究汉学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一往情深，除了促使他们不遗余力地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同时，这份深情也使他们更容易爱上中国姑娘。

李约瑟曾说：“再也没有比娶中国人为妻更能说明我对中国文化的爱恋了。”早年风流的高罗佩也是在遇到了中国姑娘水世芳之后才安定下来。他曾在自传中写道：“1943年夏天，我遇到了社会事务部的女秘书，她是来自北京的22岁姑娘，叫水世芳。在日本人侵入北京后，她与一大批大学生离开北京一路向南越过国境去了河内，最后抵达未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南部的昆明。在那儿她就读西南联大完成学业，后来又获得社会历史硕士学位。我们开始相爱，于是我向她求婚。我当时33岁，觉得过有秩序的生活和建立家庭的时刻已经到来。虽然我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港遇到过有魅力的西方姑娘，但我明白了，要和一个西方妻子永远幸福，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实现共同幸福最大可能就是与一个亚洲女人，尤其是一个中国女人结婚。”

这些老外汉学家既然喜爱并从事汉学研究，思想上当然受到东方传统文化熏陶，那些由西方文化教育出来的女子可能未必切合他们的心意；一旦天缘凑巧，当一位富有东方魅力的中国女性到来时，西方汉学家便能展开与中国女性的浪漫之旅，这种中西结合或多或少也对汉学事业有所助益。

(摘自2012年11月18日《羊城晚报》)